

抗战时期的八路军办事处



抗战时期的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(资料图)

八路军办事处诞生于第二次国共合作这一特定历史时期,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,各地“八办”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和建设活动,把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迅速传播到全国各地的前哨阵地,并在国统区这个特殊的战场为我党我军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开辟宣传阵地,开展统战工作

全面抗战爆发后,中国共产党经过同国民党进行多次谈判,蒋介石最终同意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(后改为第十八集团军),奔赴前线抗战。根据形势发展和工作需要,由我党提出,经国民党当局同意,先后在南京、上海、西安、太原、武汉、郑州、兰州、迪化(今乌鲁木齐)、长沙、南昌、广州、桂林、重庆、豫北、贵阳、香港等地设立八路军办事处、通讯处。同年9月22日,发表了《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》。23日,蒋介石发表谈话,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,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。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,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随即在全国发展起来。

八路军办事处在各地相继建立后,为我党在国统区大力开展统战工作提供了难得的条件和机会。周恩来等所作的大量的统战工作,基本是通过南京、武汉、桂林、重庆等地的“八办”开展的。在南京“八办”期间,周恩来和叶剑英等人经常拜

访和接待国民党高层中的开明人士和民主人士,向他们表明反对片面抗战和投降倒退的坚定立场,并与冯玉祥等爱国将领建立起密切的关系,使冯玉祥等在思想上进一步靠近共产党,并因此成为力主国共合作的重要代表人物。同时,“八办”同国民党内具有进步倾向的军官往来密切,向他们积极宣传八路军、新四军等人民武装力量英勇抗击日军的战绩,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抗日主张,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政治倾向,如第七十七军副军长何基津到武汉时,周恩来把他请到“八办”,对他在抗战中的爱国壮举给予了极高的评价。此后,又安排他秘密前往延安。

在重庆期间,周恩来等继续运用重庆“八办”这个公开活动的阵地,积极支持重庆文艺界进步人士排演进步话剧,鼓励各阶层的民主人士召开各种纪念会、演讲会和座谈会,并与各民主党派、进步团体建立了密切的协作关系。皖南事变发生后,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加紧迫害,为避免遭受损失,周恩来对已暴露的或可能被捕的进步文化人采取了保护措施,由“八办”设法把他们疏散到外地,其中有的安排去了延安,有的去了国外,更多的去了香港。

收集、转运军需物资

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

军后,根据国共双方达成的协议,由国民党供给军饷、军需物资和医疗器材,这项工作具体就由各地“八办”负责。为防止八路军、新四军等人民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,国民党顽固派采取了多种卑劣手段,其中最常见的是扣发各种军需物资。各地“八办”不畏艰难,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一系列的交涉。南京、桂林、西安、重庆等地办事处为此作出了极大的努力,特别是桂林“八办”在领取军需物资时,国民党顽固派总是蓄意刁难,不是少发军需品,就是让八路军到外省去领取,对此,办事处坚持据理力争,克服重重困难,为八路军、新四军争取到了相当的军需物资。

从1937年9月至1938年10月,国民党当局每月发给八路军经费63万多元,并将一批军械物资发放给八路军。中国北部各大城市和南京沦陷后,武汉成为运送抗战物资的中心枢纽。武汉“八办”也承担起主要的八路军物资收集、转运工作。武汉“八办”按月向国民政府各有关部门申报、领取军饷和各种军需品,并到交通部联系汽车将领取的物资送往前线和延安。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,随着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威望日渐升高,国民党顽固派为限制共产党的发展,不再供给八路军军需物资。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尚未建立大型的军工厂,给养十分困难,远远不能满足战斗需要。武汉“八办”便积极联络进步人士,通过武汉、湖南、江西等地的组织,购买了军需物资送给前线的八路军。此外,武汉“八办”还直接接受了爱国华侨和国际友人捐献的物资和款项。同时,香港“八办”在廖承志等的领导下,将国外及香港爱国进步人士捐赠给八路军、新四军的钱、物和慰劳品以及“八办”购买的药品等物资运往广州,再通过广州“八办”运到武汉,然后由武汉“八办”转运前线,有利支援了各地人民武装的抗战。

1938年10月,广州、武汉相继沦陷,广西成为桂林也成为联结我国西南、华南、华东和国外的重要交通枢纽。此时,香港“八办”在香港、南洋筹集的物资便主要由桂林“八办”负责接收。桂林“八办”在路莫村设立了转运站,并派出有经验的同志长年往返于这条运输线上,克服种种困难,保障运输工作的安全。

全力开展营救、保护工作

西安事变发生后,国共两党谈判中,我党提出的条件之一就是释放被国民党当局关押的“政治犯”。抗战全面爆发后,保护、转移、安置获救人员,更成为上海、南京、武汉等地“八办”的一项重要任务。尽管当时斗争环境复杂,任务艰巨,各地“八办”还是出色地完成了任务。从

1937年8月至10月,经周恩来、叶剑英等多方交涉和南京“八办”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,分别从南京、苏州、杭州、上海等地监狱、反省院获释的政治犯有陈独秀、赤色工会国际驻太平洋总工会的代表牛兰、汪得利夫妇和陶铸、刘顺元、刘宁一、钱英等共1000多人;驻晋“八办”主任彭雪枫经多方努力,大批关押在太原国民党监狱中的“政治犯”以牺盟会特派员身份,被安排到各地开展工作,其中700多人经西安“八办”转送回延安。被“八办”保护、转移并安置的同志,不久便重新归队,很多人成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骨干力量。值得一提的是,驻香港“八办”在争取港澳同胞、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对抗战的支援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,1941年12月,办事处与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先后营救出何香凝、柳亚子、茅盾、邹韬奋等旅港文化界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及其家属700余人、国际友人近100人。

为根据地广纳人才

为吸收人才,壮大革命力量,中共中央决定抗日军政大学、陕北公学、鲁迅艺术学院等在国统区招生。各地“八办”都非常注意做进步青年的宣传动员工作,并专门设立招生委员会,派专人负责。志愿到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去的青年,“八办”都为他们开具介绍信,由“八办”统一安排、派专人负责送往延安和根据地,还帮助他们解决沿途的食宿问题。南京“八办”针对许多进步青年询问如何去延安的问题,在《抵抗三日刊》上以公开问答方式,详细介绍了抗日军政大学、陕北公学的情况;武汉“八办”介绍赴延安的青年近千人,居各地“八办”前列,经武汉“八办”介绍、护送去延安和从延安派往武汉后又派往各地去的各类干部也有7000人以上;桂林和重庆“八办”也担负了护送爱国华侨、进步青年到延安的任务,每次运送军需物资,桂林“八办”都要设法输送一部分人员前往解放区;西安“八办”成为各地“八办”输送人员的中转站,仅1938年5月至8月,西安“八办”就接待、护送了2000余名进步青年前往陕甘宁边区,形成了“成千上万的各地青年子弟,不辞跋涉,不畏艰辛,齐向赤色都会的延安投奔,一批批的毕业,一批批的报到,荒凉的陕北,顿时变做山阴道上,应接不暇”的壮观景象。据记载,仅在1938年3月至5月期间,通过各地“八办”赴陕北的人数“每天平均为八百人,故陕北一带人口,一年来激增十余万人”。他们的到来,不仅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抗日根据地增添了新鲜血液,同时也激励着更多有志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,客观上为我党我军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创造了条件。

(据《人民政协报》)